

第二章 合浦汉墓的历年发掘与研究

第一节 历年发掘情况

合浦当地民众对于汉墓的认知，时间其实很短。现存崇祯十年版、道光版的《廉州府志》及民国三十一年版的《合浦县志》，均无汉墓发现和出土文物的记述。解放初期，当地百姓还把出露的砖室墓称为“直眼佬屋”，传为小个子、单眼竖直的外来人种所居房子。直至1957年，杨家岭及廉东钟屋的汉墓发掘，掀开了合浦汉墓发掘和研究的序幕。以1976年10月为界，我们把合浦汉墓的发掘分为两个阶段。

一、1957~1975年的发掘

1957年4月，广东考古工作者（1955年5月~1965年6月合浦属广东省辖）在杨家岭和廉东钟屋各清理砖室墓1座。两座墓葬结构类似，均由斜坡墓道和墓室两部分组成，墓室均为长方形双券顶式，其中杨家岭墓出土陶罐、陶壶、银戒指和铁匕首；钟屋墓已被盗，出土陶盂、陶屋、铁棺钉、五铢和半两铜钱等器物，墓砖表面及侧面带有纹饰^[1]。

70年代，广西考古工作者开展了不少汉墓发掘工作，有三次发表了较详细的发掘报告，其中前两次为配合生产建设的抢救性发掘。

1971年10月，在县城东南郊望牛岭的合浦县炮竹厂发掘大型木椁墓1座，该墓全长25.8米，最宽处14米，由墓道、甬道和墓室组成，甬道两侧带耳室。主室和耳室都有木椁结构，均为单层椁室。出土随葬品共245件，器物排列位置对称，井井有序。其中以铜器居多，并多成对出土，计有凤灯、豆形灯、博山炉、鼎、钫、壶、魁、方匜、蕉壶、奩、鉴、铜、盆、盘、屋、灶、锅、井、釜、杵臼、杯、碗、勺、镇、圆牌器、车马饰以及铜镜和五铢钱等；出土的陶器有鼎、壶、小瓮、罐、甑、提筒、屋圈、俑、猪等；铁器有剑、刀；漆器有羽觞、奩、盘、盒等；玉石器有水晶串珠、玉石塞、玉饰、花玛瑙穿坠、琥珀佩饰片、琥珀印章等；琉璃器有蓝色琉璃串珠；金器有金饼、金珠等。墓中出土的铜凤灯、金饼、珠饰品等大量精美器物以及“九真府”款陶提筒等，据此推测，墓主人可能是西汉晚期位于现越南境内的九真郡高级官员。制作精巧的铜器，色泽光亮的鎏金铜器，高度艺术水平的金平脱漆器和造型美观、质地坚硬的施釉陶器等，既表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也为我们研究汉代的厚葬之风和当时的冶炼、髹漆、制陶等手工业，以及汉代的对外交流情况等提供一批珍贵的实物资料。^[2]

1972年3月，在廉州炮竹厂第一仓库发掘1座砖室墓，该墓由墓道、前室、中室和后室四个部分组成，前室为横券顶，中室为穹窿顶，后室为直券顶，中室两边还有侧室，后室尾端带壁龛。墓葬此前已被盗扰，出土陶器有长颈壶、钵、樽、熏炉、灯模型、仓和屋，铜器有镜刷把、印章、羽觞等，在耳室一角还出土石器一件。随葬品中的陶灯模型、陶樽、龙首铜刷把及石砧石锤两用石器颇具新意，其用途值得斟酌。从墓室结构及随葬器物判断，

其中陶器 44 件（套），有罐、鼎、壶、罍、提筒、屋、仓、灶、井、猪、鸡、羊、狗；铜器 37 件（套），有洗、盆、釜、盘、镜、鼎、博山炉、灯、提梁壶、釜、樽、甑、印章、铺首环、边框、器耳等；铁剑 1 把。其余还有五铢铜钱 3 串共 162 枚，金戒指 1 枚、银戒指 2 枚、银手镯 3 只、鸡骨白龙首玉带钩 2 件、滑石方炉 1 件以及金、玉、水晶、玛瑙、玻璃、琥珀、绿松石等珠饰共计 608 颗。

1978 年 8 月，合浦县机械厂 M1 出土陶罐、壶、提筒、簋、瓮、井、屋、灶和铜樽、铜釜、金戒指、铜戒指、大泉五十铜钱以及玉、水晶、玛瑙、玻璃等珠饰，共 40 件（套）。

1979 年 4 月，合浦县炮竹厂 M1 出土陶罐、碗、坛，共 9 件；合浦县环城公社涌口生产队 M2 出土陶莲花顶（即后定名的“钵生莲花器”）1 件。另，合浦县炮竹厂挖避雷针时出土“官宜常秩”鸟兽纹规矩镜 1 件。

1979 年 11 月，合浦县环城公社砖厂 M1 出土铜鸠杖首、陶鼎、罐、壶、熏炉、杯、瓶、釜、樽、簋、屋、井和金饰、金片，共 27 件。

1980 年 9 月，合浦县环城公社文昌塔生资仓 M1 出土陶罐、熏炉、壶、樽、鼎、提筒、坛，铜盆、铜箱饰、杯、扁壶、灯、五铢钱，金戒指、银戒指、滑石耳杯以及玉、水晶、玛瑙、琥珀、绿松石等串饰，共计 34 件（套）。

1984 年 3 月，合浦县渔资站砖室墓出土橄榄型花玛瑙穿珠 1 颗；合浦县环城公社文昌塔 M153 出土铜镜 1 件、滑石璧 2 件及玻璃、玛瑙等珠饰 22 颗。

1984 年 9 月，广西博物馆会同合浦县博物馆在城南凸鬼岭清理 2 座夫妻异穴合葬墓。两墓相隔 22 米，每座墓的封土堆下各覆盖两个并列的长方形墓穴，出土器物以陶器为主，共 29 件，陶器以橙黄色、灰色硬陶占绝大多数，有壶、罐、四耳罐、鼎、瓮、釜、甑、灶等器物；铜器次之，有壶、鼎、奩、钫、釜、镜、剪轮五铢，共 18 件；铁器仅见刀、剪、钺，共 8 件。此外，还有玛瑙串饰、玻璃珠及黛石。墓葬年代为西汉晚期^[5]。同月发掘的凸鬼岭饲料厂 M7，出土深蓝色玻璃杯 2 件；M2 出土陶屋、灶、滑石方炉，共 3 件（套）。

1984 年 11 月，合浦县环城乡平田 M1 出土陶簋、罐、猪、箭、井、灶、盆、壶，共 21 件（套），铜樽、铜釜、滑石方炉、黛石各 1 件，玻璃穿珠 1 串 490 颗。

1984 年 12 月，发掘合浦县环城乡鸡射岭 M788，墓葬被盗掘一空，仅采集了几何纹墓砖标本。

1985 年 3~4 月，广西文物工作队会同合浦县博物馆在廉州炮竹厂发掘 1 座西汉晚期木椁墓。斜坡形墓道，椁室四周填以白膏泥封护。墓道底端有外藏椁，内存铁斧 1 件。随葬器物以铜器和陶器为主。铜器有耳杯、高足杯、仓、白、杵、盆、提梁桶、鼎、印、镜、灯、灶、釜、锅、釜、提梁壶、奩、盘、熏炉、魁、勺、案、甑、铺首等；陶器有瓮、罐、壶、双耳馆、屋等。此外，还出有五铢钱、铁环首刀、漆盘、漆耳杯、金饰、琉璃、玛瑙、琥珀^[6]。

1985年5~7月，广西文物工作队会同合浦县博物馆在望牛岭和风门岭共发掘墓葬13座，出土器物300余件。其中风门岭发掘土坑墓3座，砖室墓5座；望牛岭发掘土坑墓4座，砖室墓1座。土坑墓中，4座为同茔异穴合葬墓，随葬器物较丰富，以陶、铜器为主，陶器有罐、壶、鼎、井、屋、灶、灯；铜器有提梁壶、铎壶、盆、碗、杯、釜、灶、井、熏炉、奩、合、环首刀、白、杵、罍、矛、戟、药量器、三足案、镜、五铢钱，其中风门岭一座出土的1件铜铎壶，肩部刻有“西于”二字（“西于”为交趾郡属县，位于今越南首都河内西北）。另有鼎、罐、灶、钁、井等滑石器和铁剑、三脚架等出土。砖室墓多被盗扰，所余器物不多^[7]。

1986年4~10月，合浦县博物馆在丰门岭（即“风门岭”）第二麻纺厂发掘古墓10多座，其中M10保存较完整。M10为穹窿顶合券顶砖室墓，由墓道、前室和两后室四部分组成。东后室置陶器和铜器，西后室安放木棺，装饰品多出自这里，前室也出土少量器物。该墓出土器物较多，其中陶器34件，有罐、提筒、坛、灶、井、屋、仓；铜器11件，有提梁、壶、鼎、盘、樽、铎壶、熏炉、灯、碗等，装饰品包括玛瑙、玻璃、水晶等制作精美的珠饰，共189颗，还有金银器8件及成套的葬玉（玉珩、玉塞、玉珮、玉猪共10件），此外，还出有滑石炭火盆1件、铁环首刀2把。至于墓葬年代，报告定为东汉早期^[8]。

1987年3月至1988年4月，为配合南宁至北海二级公路建设，广西文物工作队会同合浦县博物馆在县城东南的文昌塔发掘古墓227座，除部分早于汉代或晚于汉代的墓葬，报告中收录的175座墓葬分五期，年代从西汉前期至东汉末期止。第一期为西汉早期，主要为没有墓道的长方窄坑墓和长方宽坑墓，以窄坑墓略多，随葬品主要有陶器、铜器及少量铁器；第二期为西汉中期，墓葬形制仍以长方窄坑和长方宽坑土坑墓为主，但有墓道的墓已普遍增多，长方窄坑土坑墓渐趋消失，宽坑土坑墓占所有墓葬的大多数。随葬品主要有陶器、铜器、铁、滑石器等，与第一期墓葬相比，随葬品已普遍增多；第三期属西汉晚期，墓葬形制为长方窄坑和长方宽坑土坑墓，绝大多数是有墓道的长方宽坑土坑墓。随葬品种类与前期相同，但数量较前期有所增加；第四期属东汉早期，墓葬形制除长方窄坑、长方宽坑土坑墓外，新增加了砖木合构墓、单室砖墓和双室砖墓，新增的墓葬形制占本期墓葬的绝大多数。随葬品仍为陶器、铜器、铁器等，陶器占绝大多数；第五期属东汉晚期，墓葬以砖室墓占绝大多数，除了有第四期出现的形制外，还增加了多室砖室墓。随葬品仍为陶器、铜器、铁器、滑石器等，以陶器占绝大多数。文昌塔汉墓是合浦汉墓群中首次发现西汉早、中、晚期和东汉早、晚五期同区域存在的墓区。较多的西汉早、中期墓葬发现，丰富了合浦汉墓的内容，为研究合浦汉墓及相关学术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报告还认为，推翻了此前合浦没有早期汉墓的说法^[9]。

1987年，合浦县罐头厂M1A、M1B出土陶鼎、罐、钵、盅、屋、灶、仓，共12件；M2出土陶罐、簋、井、案、铜泡钉、铁钉、黛石、白色串珠，共16件（套）；M4出土陶案1

件。

1988年8~11月，在环城乡红岭头发掘汉墓一批。其中，M2出土陶簋、罐、灶、屋顶、铜铺首、水晶珠，共8件（套）；M3出土铜盘、博山炉、樽、灯、镜、黛石各1件，铁环首刀2把、“大泉五十”铜钱1串50枚、银手镯2只、金戒指1枚、微雕水晶龟1件，其余还有金、银、玛瑙、水晶、玻璃等珠饰，共37颗；M28出土悬山顶曲尺形带圈陶屋1件；M11出土陶罐、壶、罍、甑、仓、灶、井、铜樽、盘、灯以及滑石方炉、玻璃杯，共计17件（套）；M7出土铜铺首1件、玻璃穿珠1串共10颗；M31出土船形两孔陶灶1件；M32出土提筒、屋、灶等5件陶器；M34出土陶仓、铜樽、盘、灯、镜、带印章、五铢钱、铁夹、钩、匕首、玻璃杯、黛石，共计14件（套）。

1988年10月，合浦县环城乡母猪岭M1出土陶仓、屋、提筒、俑、罐、鸭、井、灶、壶等29件（套），铜樽、镜、耳等3件（套），五铢铜钱、大泉五十铜钱各1串，共49枚。此外，还出有铁夹、银戒指、湖蓝色玻璃碟、谷纹玉璧各1件，以及玛瑙、水晶、玻璃等珠饰共71颗。

1989年10月，合浦县环城乡红旗岭M5出土陶屋、灶、井、提筒，共6件（套）11月，M4出土陶井1件；M2出土陶鼎、甑、楼、仓、灶、井盖、铜洗、铜钱、滑石方炉，共计8件（套）。

1990年6月，合浦县环城乡黄泥岗M1出土铜印章、滑石印章、缠花金球、金珠、玉璧、玉剑璫、玉琮、玉塞、玉佩、玉管、玉穿饰、玉带钩、碎玉片等15件（套）以及水晶、玻璃、琥珀、绿松石、玛瑙等珠饰6串，共计184颗。

1990年9~10月，合浦县环城乡五旗岭M1出土陶长颈瓶、簋、屋、灶、井，共6件（套）；M2出土陶钮、灶、屋、井、莲花顶，共4件（套）；M3出土陶钵、灯、熏炉、罐、鼎、壶、屋、井、仓、灶、铜碗、釜、洗、边框、泡钉、镜、铁夹、匕首、金银戒指、蚌贝等43件（套），五铢钱1串（11枚）以及玻璃、玛瑙、水晶、绿松石、玉石等珠饰共1226颗。

1991年7~8月，广西文物工作队会同合浦县博物馆在县城南母猪岭发掘6座东汉时期的小型砖室墓，其中M6为砖圹墓，余为直券顶墓。这批墓葬的随葬品不多，种类以陶器为主。陶器有鼎、罐、壶、钵、釜、盘、樽、瓮、盂、釜、提筒、熏炉、仓、井、灶、屋等；铜器有樽、三足盘、釜、杯、盘、灯、铜镜、柿蒂形鎏金泡钉和铜钱等；此外还有石砚、金戒指、金珠、银戒指、银镯、琉璃珠、水晶珠、玛瑙珠、琥珀珠等。从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来看，M1和M6为东汉早期，余属东汉晚期^[10]。

1990年至1996年间，合浦县博物馆还先后在母猪岭抢救性发掘墓葬10座，报告其中较完整的5座，包括3座木椁墓、1座砖圹墓和1座直券顶砖室墓，木椁墓的年代为西汉晚期，后两者均为东汉晚期。出土器物以陶器为主，有罐、四耳罐、五联罐、二联罐、瓮、四耳瓮、提筒、碗、魁、勺、杯、壶、鼎、樽、灶、屋、溷、井等种类；铜器次之，有鼎、

壶、釜、熏炉、樽、簋、盒、盆、盘、碗、杯、豆形灯、行灯、带钩、削、笄、戟、矛、扣器、铺首环、耳饰、泡钉、镜灯、五铢钱；铁器较少，仅见剑、削、剪。木椁墓和砖圹墓保存完整，除陶器、铜器、铁器、玉石器外，还出土玻璃、琥珀、水晶、玛瑙、绿松石等珠饰，其中以玻璃串珠为最多，完整的就达 6234 颗^[11]。

1992 年 10 月至 1993 年 1 月，在合浦县环城镇凸鬼岭汽齿厂发掘墓葬一批。其中，石椁 M2（明代墓）出土鎏金葫芦形饰件 1 套、金片 1 片；M17 出土金戒指、银戒指、银穿珠、玉璧、玉饰、玉环、握玉、青玉琕、青玉塞、石穿珠、玛瑙坠等 15 件（套）以及玛瑙、水晶、玻璃、琥珀、绿松石等 78 颗珠饰；M8 出土黛石 1 件；M25 出土琥珀印章 1 枚；M16A 出土铜斧、铜镜、铜钱、玛瑙穿饰各 1 件；M40A、M40B 出土银镇 1 件、铜印章 1 件，玉、玛瑙、玻璃、琥珀等珠饰，共 18 颗；M30A、M30B 出土铜印章及玉饰共 8 件（套），金穿珠 6 颗、银穿珠 1 颗以及水晶、玛瑙、玻璃、琥珀等珠饰 6 串共 237 颗（M30A 仅见水晶穿珠、玛瑙穿珠各 1 串共 4 颗，其余均出自 M30B）；M22 出土银戒指、石坠、玉饰、玛瑙剑璫等共 5 件，以及玉、水晶、玛瑙、玻璃、琥珀等串饰，共 17 颗；M41B 出土玛瑙穿珠、白色水晶穿珠共 3 颗；M19 出土白玉鸬形带钩 1 件；M6 出土玉、水晶、玛瑙、玻璃等珠饰品，共 10 颗；M9 出土红、花玛瑙穿珠 1 串 3 颗；M13 出土玉带钩、水晶穿珠各 1 件。

1993 年 2 月，合浦县环城镇风门岭麻纺厂 M02 出土红色腰鼓形玛瑙穿珠 1 件；合浦县环城镇风门岭麻纺厂 M4 出土金戒指、镂空金球、金穿珠、银手镯、玉穿饰各 1 件，银戒指 2 枚、银穿珠 2 颗以及玻璃、水晶、玛瑙等珠饰 581 颗。

1993 年 3 月，合浦县环城镇鸡射岭（土场）M18 出土金戒指 1 件、银戒指 3 件以及琉璃穿饰、骨穿饰各 1 串。

1993 年 5 月，合浦县环城镇凸鬼岭饲料厂 M02 出土红、花玛瑙穿珠 1 串 3 颗；M1 出土红色玛瑙穿珠、各式琉璃穿珠各 1 串。

1993 年 9 月，合浦县环城镇北插江 M4 出土金戒指 2 枚、银戒指 1 枚、金花球 1 串 5 颗以及各式金、玉、水晶、玛瑙、玻璃、琥珀等穿珠共 57 颗；M5 出土玉穿饰 1 件，水晶、玛瑙、琥珀穿珠各 1 串，共 12 颗。

1994 年 2 月，合浦县环城镇凸鬼岭汽齿厂 M1 出土花玛瑙戒指 1 枚。

1995 年 3~5 月，合浦县环城镇北插江 M10 出土玛瑙、玻璃、琥珀、绿松石珠饰，共 34 颗；北插江第二麻纺厂 M23 出土银戒指 1 枚，水晶、石、玛瑙、玻璃、琥珀等串饰 6 串，共 64 颗；M27 出土石穿饰 1 件，黄金、玛瑙、水晶等珠饰，共 11 颗；M30 左室出土龟背形银印章 1 枚以及水晶、玛瑙、玻璃、绿松石、琥珀等串饰，共 5 串 35 颗；M32 出土玛瑙穿饰 1 串 3 粒。合浦县环城镇磨囊平田村公所 M1 出土红色腰鼓形玛瑙穿珠 1 颗；M3A 室出土银戒指 1 枚以及黄金、琥珀穿珠各 1 串，共 6 颗；M3B 室出土金戒指 1 枚以及黄金、玛瑙、玻璃等珠饰，共 35 颗；M9 出土金、银、玛瑙、水晶、玻璃、绿松石、琥珀等各式穿

珠，共 32 颗。

1995 年 5 月，广西文物工作队在中站盘子岭发掘砖室墓 38 座，其中 1 座为合葬墓，年代分属东汉早、晚两期。形制以直券顶墓居多，部分为砖木合构墓、穹窿顶合券顶墓和双穹窿顶墓。仅 2 座墓葬保存较完整，其余盗扰严重，所剩随葬品很少，计有陶罐、四耳罐、壶、铎壶、钵、甑、孟、樽、簋、提筒、案、灯、屋、仓、灶、井及筒瓦，铜镜、环，铁环首刀、凿、镞，银镯、黛石砚等，此外还出有部分铜钱，有五铢钱、大泉五十和货泉^[12]。

1995 年 6 月，合浦县环城镇凸鬼岭康宝饲料厂 M1 出土红、花各式玛瑙、琥珀、玻璃等穿饰各 1 串共 45 颗，绿松石穿饰 1 颗。

1996 年 12 月，广西文物工作队在禁山七星岭发掘砖室墓 11 座，均破坏较严重。除其中 1 座为无墓道的单室墓外，其余带斜坡墓道，直券顶墓或穹窿顶合券顶墓，墓室前端有甬道，多带侧室，部分后室的前端还有祭台。出土陶器灶、井、仓、厕、案、莲花状器、釜、罐、直腹罐、双耳杯、碗、器盖、带钩，铜器有鼎、盆、铎壶、碟、碗、盃、提梁壶、剑、镜，以及滑石盆和铁刀等，报告者年代均定为东汉晚期^[13]。

1999 年 4~5 月，广西文物工作队会同合浦县博物馆在凸鬼岭发掘汉墓 17 座，有土坑墓、砖木合构墓和砖室墓三类。随葬器物以陶器居多，主要有罐、壶、樽、鼎、孟、灯、瓮、熏炉、魁、甑、提筒、屋、仓、井、灶等；铜器有鼎、壶、提梁壶、铎壶、樽、碗、盘、杯、耳杯、盆、灯、印、剑、矛、削、镜、铜钱；铁器有剑、削、剪；滑石器有鼎、方盒、盘、杯、缸、暖炉、灶、釜、屋、仓，其中 M6 和 M11 出土滑石器较多。此外，出有金戒指、石黛砚、水晶珠、玛瑙饰品、琥珀、琉璃珠、玉管等。墓葬年代分属西汉晚期、东汉早期和东汉晚期^[14]。

2001 年 7 月，广西文物工作队会同合浦县博物馆在九只岭发掘墓葬 6 座，其中明墓 1 座，余 5 座为东汉墓。东汉墓分砖木合构墓和砖室墓两类。砖木合构墓中，M5 为砖木合构墓，竖穴，木椁，仅封门用砖；M6a 为穹窿顶合砖圹墓。出土器物主要为陶器和铜器，陶器有鼎、盆、壶、釜、罐、提筒、瓮、孟、卮、豆、釜、案、纺轮等生产生活用具及屋、仓、井、灶等模型明器；铜器有鼎、壶、樽、盘、盆、碗、熏炉、灯、镜、带钩、印章、泡钉、钱币及漆器朽后留下的铜箍、鎏金铜扣、铜耳等；铁器有削、剑、棺钉等；还多见金花球、玻璃、琥珀、玛瑙等珠饰。这次发掘，不仅填补合浦汉墓一些形制上的空白，更为建立可靠的东汉前、后两期断代标尺提供了材料^[15]。

2003 年 11 月，广西文物工作队会同合浦县博物馆在罗屋村发掘砖室墓 6 座，该墓地盗扰严重，随葬品多已无存，计有陶器 12 件，有碗、碟、罐、灯、纺轮等，铁钉 4 颗，琉璃珠 73 粒。从形制和残存器物观察，墓葬年代应为东汉晚期，部分下限也可能晚至三国时期。其中，M3 墓葬开口两侧发现排列整齐的两列柱洞，两两相对，应为墓上建筑遗存；

M6 位于墓区西边，游离于墓群之外，平面呈长方形，平砖盖顶，墓室长 1.75、宽仅 0.3、高仅 0.2 米，随葬小陶罐 1 件，墓主应为未成年人^[16]。

2003 年底至 2005 年初，广西文物工作队会同合浦县博物馆在风门岭发掘汉墓 8 座，包括木椁墓和砖室墓。出土陶器、铜器、滑石器、金银器、铁器、珠饰等一大批珍贵文物，年代跨西汉中期、西汉晚期、东汉早期和东汉晚期四期^[17]。其中，M27 断为西汉中期，M23、M26 断为西汉晚期，均为木椁墓；M21 为直券顶砖室墓，已被盗掘，墓内无任何遗物，判断为东汉早期；M22、M24、M25、M28 均为砖室墓，年代为东汉晚期。

2005 年 8~9 月，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合浦县博物馆在文昌塔发掘汉墓 8 座，其中 6 座木椁墓为西汉晚期，余 2 座砖室墓分属东汉早、晚期。部分木椁墓的墓道底端两侧有一重或两重的凹槽，象征封门的门柱，或见可能为墓上建筑的洞槽遗存，或墓室底部后端用石板护边等等。另外，墓地在防潮防水方面也颇有特点，如在墓道前端筑沙槽，墓壁下部有排水沟等。这批墓葬的随葬器物不多，经修复后陶器 82 件（组），有瓮、罐、双耳罐、四耳罐、五联罐、壶、盂、釜、熏炉、井、仓、灶、厕等；铜器 23 件，有鼎、铎壶、壶、盆、碗、釜、灯、印、镜、扣、铜钱等。此外，还有铁器、滑石器、砺石及玉石、水晶、玛瑙、琉璃串饰共 10 件（组）。这批汉墓的形制和随葬器物较以往的发现更具地域特点，为分期及了解合浦汉墓的区域特征均提供了重要资料^[18]。

2005~2009 年的数年间，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在禁山、风门岭、炮竹厂、凸鬼岭、杨家山等地陆续开展抢救性发掘，还发掘了古墓 56 座，年代从西汉晚期延至南朝，其中以汉墓居多。汉墓有木椁墓、砖木合构墓、砖室墓三类，砖室墓又分直券顶、横直券顶、穹窿顶、穹窿顶合券顶等。砖木合构墓和砖室墓多遭盗扰，随葬品所余不多，部分甚至被盗掠一空；木椁墓的保存情况稍好，出土随葬品也较多。随葬品以陶器为主，另有铜器、铁器、银器、玉石器及琉璃、玛瑙、琥珀、水晶等珠饰^[19]。

2008~2009 年，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还在寮尾墓地发掘古墓 32 座，因发现重要，故单独报告。其中东汉晚期墓 7 座，三国墓 25 座。汉墓形制有砖圜墓和砖室墓两类，砖室墓又可分为直券顶墓、穹窿顶合券顶墓、横直券顶墓和横直券顶合穹窿顶墓。随葬品以陶器为主，还有铜器、铁器、银器、玉器、玻璃器、滑石器以及水晶、玛瑙、琥珀、玻璃珠等串饰。出土的青绿釉陶壶、铜钹、胡人俑座灯、焊珠金饰片、钠钙玻璃、蚀刻玛瑙珠等较多与海上丝绸之路密切相关的器物，一些尚属初次发现^[20]。

2009~2013 年，为配合各项基建项目，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在杨家山、禁山官塘岭、汽齿厂、第二炮竹厂、廉州乳品厂、精神病院、电厂、迎宾大道、罗屋村、沿海铁路合浦段、中站李屋村、森林公园、南方机械厂、中站庞屋队、火车站等 15 处地点陆续发掘古墓 157 座，年代跨西汉晚期至晋代。其中汉墓 62 座，有土坑墓、木椁墓和砖室墓三类，主要为砖室墓。出土陶钵生莲花器和卷棚顶陶仓等一大批重要文物。西汉晚期墓 15 座，

均为木椁墓。随葬品种类丰富，计有陶器 217 件，铜器 99 件，铅锡合金灶 1 件，铁器 24 件，滑石器 21 件，玛瑙、玻璃、琥珀、水晶和蚀刻石髓珠等珠饰品 11 件（套），还有石黛砚、砺石等；东汉墓可分早、晚两期，共 47 座，其中土坑墓 1 座、木椁墓 2 座，余为砖室墓。随葬器物计有陶器 368 件，铜器 82 件，铁器 19 件，石黛砚 8 件，滑石器 9 件，银器 4 件，漆器 14 件，玻璃珠等串饰 11 件，另有薏苡的植物种仁等^[21]。

2012 年 6~9 月，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对位于大浪古城北面、编号为 D2 的土墩墓开展发掘。墩体为一墩多墓结构，共发现 3 座长方形熟土坑墓。随葬器物有陶罐、甑、杯、瓮、铜钱、铁钉等。年代为秦至西汉早期，这是岭南地区第一次确认土墩墓的存在。之前 2003 年试掘的 D1，亦应为土墩墓。从器物来判断，年代略晚，为西汉中期。土墩墓的发掘，对南方土墩墓及越族迁徙的研究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对当地汉代考古的意义同样重大^[22]。

历年合浦汉墓的许多发掘资料，未整理刊布。合浦县博物馆的藏品显示，1974 年至 1995 年间该馆至少还抢救性发掘了汉墓 88 座，其中包括出土器物较丰富的西汉晚期墓北插江盐堆 M1 和东汉早期墓黄泥岗 M1 等。黄泥岗 M1 随葬滑石“徐闻令印”和龟钮“陈褒”铜印，墓主应是东汉早期徐闻县令“陈褒”，这是合浦汉墓中唯一一座明确墓主身份地位的墓葬。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等单位，也藏较多历年发掘的墓葬资料。

第二节 以往的研究

以往的发掘报告和研究集中在墓葬分期、出土器物和埋葬习俗等方面，而就合浦汉墓的整体研究尚未展开，至今还没有一本系统、全面的专著出版。有关合浦汉墓的文化因素分析以及与海外贸易相关出土珠饰的多学科综合研究，也有待于在更广阔的视野下深入开展。

一、墓葬分期研究

墓葬分期对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考古学研究不可或缺，一些与中西交流相关的文物，其传播的时间节点须相对明确。另者，分期可以更好地补充、证实与信史对应的有关记载。这在历史时期考古中，也犹为重要。

岭南汉墓的分期多以广州汉墓为参照。广州汉墓分布集中，年代序列完整，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发掘资料的基础上，麦英豪等根据墓葬形制和主要陶器的演变等划分为五期，其中西汉墓分前、中、后三期，东汉墓分前、后二期^[23]。虽有学者对西汉前期墓的断代提出异议^[24]，但就总体而言，广州汉墓的分期体系仍不失为指导岭南地区秦汉考古的重要标准。合浦汉墓亦循此例，为与中原及岭北其他地区统一起见，分为秦代和西汉早期、西汉中期、西汉晚期和新莽时期、东汉早期和东汉中期等五期^[25]。

历年发表的报告，大都涉及分期研究。《合浦风门岭汉墓——2003~2005年发掘报告》分析了8座汉墓的形制、典型器物组合和演变规律，将其分为西汉中期、西汉后期、东汉前期和东汉后期^[26]。报告注意到合浦汉墓发展演变的滞后性，力图构建区域的科学分期体系。西汉晚期的木椁墓，除此次发掘保存基本完好的M23和M26外，还参考了合浦其他墓区之前发掘的同时期墓葬资料，依据较为充分，但断为西汉中期的墓葬，仅M27一座，尚待以后的发现验证；九只岭发掘的5座东汉墓中，保存完整的M5和M6，典型器物演变明显，因而建立了可靠的东汉前后两期的断代标尺；2008~2009年发掘的寮尾墓地，地处墓葬群的边缘地带，以三国墓居多。这批三国墓，形制和器物与东汉晚期墓存在密切联系，但发展演变仍十分清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从汉代大一统国家到三国分治的社会变革。此前，虽有学者注意到东汉晚期墓至三国墓形制的一些变化^[27]，但这次大规模的发掘，对系统了解“合浦汉墓群”的内涵、东汉晚期至三国墓葬的分期演变，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2009~2013年度合浦汉晋墓发掘报告》综合以往划分标准，对墓葬形制进行全面、细致分析，根据墓葬形制及随葬器物组合、器物特征等将62座汉墓划分为西汉晚期、东汉早期及东汉晚期，并归纳出年代特征。^[28]

新近出版的《广西合浦文昌塔汉墓》，收录墓葬175座，亦仿《广州汉墓》分为五期^[29]。其中的第一期断为西汉前期，共64座。除器物种类较少外，其余大体可对应广州汉墓第一期的后段，即南越国后期；第二期断为西汉中期，共36座。这两期的断代，或可商榷。合浦汉墓发展演变相对于广州汉墓而言，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如广州西汉前期墓就出现了井、灶模型明器，合浦汉墓则在西汉中期才始见；广州汉墓中常见的陶四耳瓮、陶簋等，合浦汉墓中也出现较晚；广州东汉前期的横直券顶砖室墓，合浦至少到东汉末年才出现，等等。报告中的第一期也出现了一些比较晚的因素，如三足陶盒(文M63:4)与广州西汉中期的I型三足盒(2030:14)几乎如出一辙；滑石璧在广州西汉中期墓才出现。不可否认地，第一、第二期的演变诚如报告所言，变化较为明显，但从大的历史背景来看，很可能与合浦置郡县后，汉文化大举进入，对本地越文化产生冲击进而迅速演变有关，按照墓葬断代唯晚的原则，这两期定为西汉中期的前、后两段，或更吻合当时的历史进程，也更切合埋葬习俗滞后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此外，由于该发掘时日已久，报告中许多墓葬信息缺失，现场照片没有发表，砖室墓券顶形状无一描述，也没有作出基本判断；一些非常重要的文物被遗漏，没有列入报告^[30]；与之前发表的许多报告相类，未使用“木椁墓”这一学术界普遍认同的形制概念，把木椁墓混同于土坑墓。因此，对该报告的分期，尚需更多发掘资料来印证。

还有部分报告的分期，由于发掘者的认识不一，结论亦不尽相同，特别是在东汉早期与东汉晚期墓、东汉晚期与三国墓的分期上，出现了一些偏差。比如，风门岭M10的简报中，对陶器作了不恰当的比对，还把出土的大泉五十和货泉当成该墓属东汉早期的证据。

之后，有学者更正为东汉晚期^[31]。又如，禁山七星堆发掘9座墓，简报均断为东汉后期，但从其出土的铜提梁壶、B型陶灶等器物的型式来看，部分墓葬的年代已晚至三国时期^[32]。此外，五期划分法并非完美无缺。东汉晚期上限以建初为界，下限到东汉末年（公元220年），年代跨度达140余年。一些报告注意到早晚期之间的过渡阶段，笼统提及“东汉中期”^[33]，但由于材料过少，阶段的特征无法明晰。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分期，多着眼于各个发掘墓区，而针对整个合浦汉墓的统一分期，目前尚未确立。随着合浦汉墓在研究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学术界更加重视合浦汉墓的研究。近年来，一些硕博论文及博士后出站报告选择了合浦汉墓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也涉及断代分期的内容^[34]。其中，富霞收集140座合浦历年发掘的汉墓，对其形制及随葬器物作系统研究，尝试建立本地区统一的、科学的分期标准。

二、出土器物研究

有关合浦汉墓出土器物，除报告所作的基础研究外，海上丝绸之路相关文物和铜器等也有不少著述，其余器类则多为旁及。

汉墓出土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的文物，尤其是玻璃器，是研究的热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安家瑶^[35]、史美光^[36]、黄启善^[37]、干福熹^[38]、王俊新^[39]、李青会^[40]、王伟昭、熊昭明、碧姬·博雷尔(Brigitte Borell)^[41]等国内外学者持续关注，对其型式、成分特征和来源等进行探讨。2010年，熊昭明和李青会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合浦汉墓出土玻璃器为主，对广西出土的汉代玻璃器开展考古学和科技综合研究，并与周边地区、东南亚、南亚及地中海地区出土的同期玻璃器进行比较，分析其制作技术、成分体系和源流等。他们的初步研究表明，合浦出土的玻璃器主要为本地自制，还有部分来自东南亚、印度和罗马等地，初步厘清了合浦出土玻璃器的源流^[42]。黄珊等人将合浦寮尾东汉墓出土的绿釉陶壶与国外发现的同类型陶壶及我国汉代绿釉陶器进行制作工艺和成分的比较研究，认为合浦出土的这件陶壶产自今伊朗西南部和伊拉克，生产年代在公元43~200年^[43]。其他研究对象，还有铜钹^[44]、金珠饰品^[45]等。此外，熊昭明还对合浦汉墓出土的有关海上丝绸之路出土文物进行系统阐述，这些文物囊括了玻璃、石榴子石、琥珀、肉红石髓、玛瑙、蚀刻石髓珠、水晶、绿柱石、黄金等饰品及作为非贸易品的波斯陶壶和铜钹^[46]，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除前述输入的铜钹外，其他铜器的研究也较多。富霞将合浦出土汉代青铜器作系统梳理，还联系海南、徐闻、越南北部等北部湾地区的发现，初步分析各类器物演变规律，总结其地域特点和发展特征，认为合浦出土的汉代青铜器发展脉络清晰，兼容多种文化因素，随葬铜器的多寡，反映了汉代合浦地区贫富的悬殊^[47]。该文收集的资料较全，惜内容略简；熊昭明将合浦汉墓特有的铜井仓灶完整组合与北方地区同期出现的井、灶等进行对比，认为两者之间并无直接关系，合浦所出仿自当地的陶器，为本地制作，推测为临时“订制”。出土铜井仓灶的墓葬，规模较大，随葬品丰富，墓主人身份地位较

高。相邻的广西梧州发现的铜屋，很可能从合浦输入^[48]；蒋廷瑜对汉代出土的篆刻花纹铜器，分种类、制作工艺、时代和制作中心的推断等方面进行系统论述，认为此类铜器的流行时间上起西汉中期，下至东汉晚期，岭南地区尤其广西东南部，是汉代篆刻花纹铜器的主要产地和制作中心^[49]。文中选取的标本主要出自广西地区汉三郡治所的梧州、贵港与合浦，而三地之中，以合浦最多。不过，赵化成认为，所谓的篆刻花纹，多为铸造^[50]。但无论如何，此时青铜器在中原已日渐式微，而在合浦，以篆刻花纹（或铸造细线纹）为主要特征的精美器物，如日中天，显示了作为汉代港口城市繁荣的一面。

玻璃器等器物的科技测试与分析内容较多，附录于后（见附录一）。其余琥珀印章^[51]、玉器^[52]、灯具^[53]、仿铜陶礼器^[54]、陶屋^[55]、陶井^[56]等，也有研究涉及。

三、葬俗研究

主要涉及合葬墓、外藏椁及架棺葬、碎物葬、厚葬等方面内容。这些习俗，虽糅合了多种文化因素，但皆源自本土，反映了作为汉礼中重要内容之一的丧葬制度所固有的稳定性。“事死如事生”的厚葬之风盛行，使得作为奢侈品的珠饰有较大数量出土。

合葬古已有之，汉代是夫妻合葬墓的重要发展和转型时期。在合浦已发掘的各个墓区中，均有合葬墓发现。蒋廷瑜认为岭南地区的同坟异穴夫妻合葬墓出现于西汉早期，西汉中期开始流行，并盛行于西汉晚期。合葬墓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和长期采用木椁相关，是同坟同穴合葬墓的变体或旁枝，虽是一种带地域性的葬式，但并没有形成本地的特殊葬俗，不能把它作为特有的民族习俗来看待。而且补充，岭南地区自东汉前期起盛行小砖券墓，由于砖比木材坚固耐久，夫妻同穴合葬一般不成问题，同坟异穴合葬就自然而然地消失了^[57]；林强把岭南汉代夫妻合葬墓分为同坟异穴和同坟同穴两个类型，认为其演变发展是同时的，但东汉时期同坟异穴合葬墓已明显减少，还认为岭南地区的合葬墓具有本地特点，在形制和发展演变方面与中原地区有较明显的差异^[58]。合葬墓的葬俗源自中原，西汉前期和中期，夫妻合葬墓与以前一样，采取异穴合葬的形式，西汉中期以后，制度一变，除帝陵以外，一般都采取夫妻同穴合葬^[59]。合浦的合葬墓以异穴合葬为常见，最早出现在西汉晚期。从考古发现来看，东汉时期并未消失，甚至依然盛行，东汉晚期的砖室墓中，凤门岭 M24、寮尾 M13、九只岭 M4 和 M6、二炮厂 M14 等均属这种类型。异穴合葬墓的长期流行，笔者以为，这是由于合浦地处偏远、葬俗演变滞后所致，而与所处的自然环境和长期采用木椁的关系并不大。

合浦汉墓中，有带外藏椁。广西汉墓的外藏椁制度在西汉早期由中原地区传入时，尚保存真人殉葬的习俗，到西汉中晚期确立“厨、廐之属”的内涵，再到东汉早期的衰落，与中原地区发展基本同步，但也表现出一些不同的区域特征^[60]。西汉晚期合浦的发现，共有 6 座墓葬，其中堂排 M2b、凸鬼岭 M6、堂排 M4 和望牛岭 M1 为耳室形，凤门岭 M26 和另一座 1985 年发掘于合浦炮竹厂的木椁墓，外藏椁置于墓道底端。推测这些墓葬的主人应

为郡守级的官吏或权贵阶层，也可能是南下的汉人。广州汉墓未见合浦出现的外藏椁形式，反映了两广汉墓之间的历史分野^[61]。

汉代合浦盛行厚葬之风。林强将广西汉代厚葬分为西汉和东汉两大时期，西汉时期有大型棺椁墓和中型墓两种厚葬方式，为上层统治阶级、贵族所采用，东汉时期则多为中型砖室墓，随葬品明显减少。认为厚葬习俗产生的主要原因，有精神信仰、儒家思想和经济发展三个因素^[62]。事实上，厚葬之风不仅仅局限于“上层统治阶级、贵族”，合浦的许多中小型汉墓，无论是构筑用工用材，还是随葬器物，相对于墓主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而言，亦入厚葬之列。厚葬之风在汉代社会是普遍盛行，富者奢靡僭越，一般百姓穷尽财产，谓“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至于富者奢僭，贫者单财，法令不能禁，礼仪不能止”^[63]，以至于“废事生而营终亡，替所养而为厚葬”^[64]。

合浦汉墓的一些其他葬俗，也有学者注意到。岭南汉墓中开口常见的柱洞，郑君雷按性质和功用划分为“封门排柱”、“椁盖顶柱”、“椁板壁柱”、“棺架立柱”、“甬道门柱”、“棺椁围柱”和“墓上表木和墓上建筑”等七类，认为文昌塔 M6 和 M8 在墓道底端近墓室处的柱洞，应为甬道门柱，而文昌塔 M5 和罗屋村 M3 墓口的柱洞，似与筑墓时搭建的临时建筑有关^[65]。岭南战国秦汉还现架棺葬俗，合浦母猪岭 M4 应属此类，上层为棺室，下层为器物室^[66]。此外，合浦汉墓中还发现了碎物葬，其中汽齿厂 M9 和 M11 随葬的部分器物残块，分置几处，而且相距甚远，应为入葬时有意打破后放置；二炮厂 M4 出土 1 面铜镜，仅见一小段外缘。碎物葬早在中原的史前墓葬出现，商周至秦汉时期在越族地区仍较普遍，商周时期的武鸣马头元龙坡墓地、广东博罗横岭山以及桂平大塘城、贺州凤凰岭汉墓均有发现。富霞认为，墓主为汉化越人的可能性较大^[67]。

四、其他研究

墓葬形制方面，与域外因素有关的叠涩穹窿顶，其源流受到了关注。学者结合相关研究指出，东汉晚期流行于合浦乃至岭南一带的叠涩穹窿顶墓，其构筑方法受到了中亚地区帕提亚——巴克特里亚系统的影响^[68]。彭长林^[69]、邓家倍^[70]、王元林^[71]、覃主元^[72]等学者还从不同角度论述汉代合浦港的作用和重要地位，一些讨论及合浦港现今的大致方位，为研究汉代合浦郡、合浦港，及其与徐闻、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等提供思路。在开展合浦港考古工作十多年后，熊昭明对其阶段性进展予以了介绍^[73]。此外，2004 年召开“中国·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还结集收入了广西文物工作队课题组及司徒尚纪、黄铮、吴三保、廖国一、丘立诚、黄启善、傅举有、程存洁、李富强等学者的有关论文”叫；2016 年 10 月，北海举办“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收到论文 100 余篇。上述论文，不少基于合浦汉墓的出土资料。值得注意的是，极少数学者从近代地方史志出发，错误析读考古资料，有关港址的结论，显得可靠性很低^[75]。

还有学者从汉墓资料出发，试图对合浦乃至岭南的秦汉社会作初步复原。对于岭南汉

文化的形成过程，郑君雷认为，岭南汉文化的形成是建立在汉越民族融合的基础上，其优势地位是在西汉中晚期确立，表现为广州、合浦等地汉墓与中原和岭北汉墓的发展轨迹已经趋同，鲜见越式因素，但地方特点仍然突出，可视为汉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76]；富霞、熊昭明着眼于合浦发现的土墩墓，结合江浙、福建、广东、湖南和越南北部的发现，论述史载从先秦时期开始、沿东南沿海的“越人南迁”路线的真实存在，说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开通之前，北部湾地区与东南沿海通过海路的密切联系已经存在^[77]；蒋廷瑜就考古发现的铁质农具、种子、农副产品以及与相关的陶仓模型明器等，对包括合浦在内的汉代广西农业概况作了概括^[78]；冼剑民从岭南的视角上，论述农业、青铜业和冶铁业、商业萌芽等内容^[79]，吕名中对岭南的经济发展及特色亦作了探讨，认为当时的岭南地区经济发展及社会面貌与中原及江南地区相比虽显得比较后进，但与该地区前一时期相比，已发生了很大变化^[80]。

-
- [1] 杨豪：《广东合浦发现东汉砖墓》，《考古通讯》1958年第6期。
- [2]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写作小组：《广西合浦西汉木椁墓》，《考古》1972年第5期。这座墓葬的编号为望牛岭M1，同时发掘的另一座墓，编号M2，资料未见发表。据当年参加发掘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李举荣先生回忆，两墓位于同一封土堆下，应属同莹异穴合葬墓。
- [3]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合浦风门岭汉墓—2003~2005年发掘报告》附录一，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
- [4]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合浦县堂排汉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4》，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46-56页。
- [5]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县凸鬼岭清理两座汉墓》，《考古》1986年第9期。
- [6] 蓝日勇：《合浦县廉州炮竹厂西汉晚期墓》，《中国考古学年鉴》，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190页。
- [7] 黄启善：《合浦县风门岭、望牛岭汉墓》，《中国考古学年鉴》，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190-191页。
- [8] 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县丰门岭10号墓发掘简报》，《考古》1995年第3期。
- [9]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广西合浦文昌塔汉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年。
- [10] 广西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县母猪岭东汉墓》，《考古》1998年第5期。
- [11] 广西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县母猪岭汉墓的发掘》，《考古》2007年第2期。
- [12]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北海市盘子岭东汉墓》，《考古》1998年第11期。
- [13]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合浦县禁山七星岭东汉墓葬》，《考古》2004年第4期。
- [14]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合浦县凸鬼岭汉墓发掘简报》，《广西考古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265-285页。
- [15]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县九只岭东汉墓》，《考古》2003年第10期。
- [16]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县罗屋村墓葬发掘报告》，《广西考古文集》（第二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313-323页。
- [17]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合浦风门岭汉墓—2003~2005年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
- [18] 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合浦县博物馆：《2005年合浦县文昌塔汉墓发掘报告》，《广西考古文集》（第三辑），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01-131页。
- [19]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内部资料。
- [20] 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师范大学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合浦县寮尾东汉至三国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2年第4期。
- [21]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合浦县文物管理局：《2009~2013年度合浦汉晋墓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年。
- [22]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广西合浦县双坟墩土墩墓发掘简报》，《考古》2016年第4期。
- [23]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
- [24] 李龙章在《南越国出土陶器与两广战国秦汉遗存年代序列》（《华南考古1》，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一文中认为，《广州汉墓》对西汉前期墓的断代及分期与实际情况有较大出入，应予修正。
- [2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秦汉卷》第八章第十一节“岭南地区汉墓”，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82-491页。
- [26]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合浦风门岭汉墓—2003~2005年发掘报》，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
- [27] 韦革：《浅谈合浦东汉晚期至三国时期墓葬形制的一些变化—从合浦岭脚村三国墓说起》，《广西考古文集》（第二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528-534页。

- [28]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合浦县文物管理局:《2009~2013年度合浦汉晋墓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年。
- [29]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广西合浦文昌塔汉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年。
- [30] 后文提及的角轮形环、六棱柱饰、碗、杯等4件玻璃器。
- [31]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合浦凤门岭汉墓—2003~2005年发掘报》,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17-118页。
- [32] 熊昭明:《广西汉代考古的回顾与展望》,《广西考古文集》(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60-71页。
- [33] 广西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县母猪岭东汉墓》,《考古》1998年第5期。
- [34] 谭玉华:《合浦汉墓研究》,中山大学博士后出站报告,2013年;蒙长旺:《广西合浦两汉六朝墓葬研究》,中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富霞:《合浦汉墓及相关问题研究》,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
- [35] 安家瑶:《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
- [36] 史美光、何欧里、周福熹:《一批中国汉墓出土钾玻璃的研究》,《硅酸盐学报》1986年14卷3期。
- [37] 黄启善:《广西汉代玻璃制品初探》,《中国古玻璃研究—1984年北京国际玻璃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年,75-81页;《广西古代玻璃制品的发现及其研究》,《考古》1988年3期;《广西发现的汉代玻璃器》,《文物》1992年9期。
- [38] 干福熹、黄振发、肖炳荣:《我国古代玻璃的起源问题》,《硅酸盐学报》1978年6卷1-2期;干福熹:《关于中国古代玻璃研究的几点看法》,《硅酸盐学报》2004年30卷2期;《古代丝绸之路和中国古代玻璃》,《自然杂志》2006年28卷5期。
- [39] 王俊新、李平、张巽、彭子成:《广西合浦堂排西汉古玻璃的铅同位素示踪研究》,《核技术》1994年17卷8期。
- [40] Qinghui Li, Weizhao Wang, Zhaoming Xiong, Fuxi Gan & Huansheng Cheng, 2009. PIXE study on the ancient glasses of the Han dynasty unearthed in Hepu county, Guangxi. In book: Ancient Glass Research Along the Silk Road. Edited by Gan Fuxi, R. H. Brill & Shouyun Tian.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p. 397-412. 王伟昭、熊昭明、李青会、干福熹:《广西合浦县出土汉代玻璃器的检测和研究》,《丝绸之路上的古代玻璃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205-215页。
- [41] 碧姬·博雷尔:《早期北部湾地区的汉代玻璃器皿》,《海洋史研究》(第四辑)第27-44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 [42] 熊昭明、李青会:《广西出土汉代玻璃器的考古学与科技学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
- [43] 黄珊、熊昭明、赵春燕:《广西合浦县寮尾东汉墓出土青绿釉陶壶研究》,《考古》2013年第8期。
- [44] 熊昭明:《广西合浦汉墓出土铜钹略考》,《汉代西域考古与汉文化》,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327-331页。
- [45] 白云翔:《岭南地区发现的汉代舶来金银器述论》,《西汉南越国考古与汉文化》,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陈洪波:《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出土金珠饰品的考古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 [46] Xiong Zhaoming. 2014. The Hepu Han tombs and the Maritime Silk Road of the Han dynasty. Antiquity, Volume 88, Number 342. pp. 1229-1243. 熊昭明:《汉代合浦港考古与海上丝绸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年。
- [47] 富霞:《广西合浦出土汉代青铜器的初步研究》,《广西考古文集》(第四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372-402页。
- [48] 熊昭明:《合浦汉墓出土的铜井仓灶》,《瓯骆汉风》,香港历史博物馆编,2014年,第26-33页。
- [49] 蒋廷瑜:《汉代篆刻花纹铜器研究》,《考古学报》2002年第8期。
- [50] 2016年10月在北海“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岭南双绝:汉代细线纹铜器与漆绘铜器”的发言内容。

- [51] 黄展岳:《“朱庐执刳”印与“劳邑执刳”印——兼论南越国自铸官印》,《考古》1993年第11期;蒋廷瑜:《“劳邑执刳”琥珀印考》,《中国历史文物》2004年第4期。
- [52] 熊昭明、谢日万:《广西出土的先秦两汉玉器》,《广西考古文集》(第三辑),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541-551页。
- [53] 熊昭明:《广西汉代出土灯具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2期;谢广维:《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馆藏马座灯辨识》,《广西考古文集》(第五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346-350页。
- [54] 朱海仁:《岭南汉墓出土仿铜陶礼器的考察》,《华南考古1》,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13-121页。
- [55] 曹劲:《先秦两汉岭南建筑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石拓、程建军:《汉代陶屋所反映的岭南民居的变迁——试论“三间两廊”的形成》,《建筑师》2013年第3期。
- [56] 李世佳:《广西汉墓出土陶井明器初探》,《农业考古》2014年第4期。
- [57] 蒋廷瑜:《汉代同坟异穴夫妻合葬墓浅议》,《南方文物》1993年第1期。
- [58] 林强:《岭南汉代夫妻合葬墓有关问题的探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
- [59]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390页。
- [60] 谢广维:《广西汉代“外藏椁”初探》,《广西考古文集》(第二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506-517页。
- [61] 熊昭明、谢广维:《广西西汉中晚期墓葬的外藏椁》,《汉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第284-289页。
- [62] 林强:《广西汉代厚葬习俗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00年第2期。
- [63] (南朝)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卷一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51页。
- [64] (南朝)范晔:《后汉书·赵咨传》卷三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315页。
- [65] 郑君雷:《岭南战国秦汉墓的“柱洞”》,《四川文物》2010年第4期。
- [66] 郑君雷:《岭南战国秦汉墓的“架棺”葬俗》,《考古》2012年第3期。
- [67] 富霞:《合浦汉墓及相关问题研究》,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
- [68] 熊昭明:《汉代合浦港考古与海上丝绸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145页。
- [69] 彭长林:《试论汉代合浦港的兴衰与海外贸易的关系》,《广西环北部湾文化研究》,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19-542页。
- [70] 邓家倍:《合浦是中国汉代海上“丝路”始发港》,《广西地方志》2002年第5期;《再论合浦是中国汉代海上丝路始发港》,《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合浦与徐闻在海上丝路始发港地位与作用比较研究》,《中国地方志》2005年第10期。
- [71] 王元林:《两汉合浦、徐闻与南海丝路的的关系》,《广西民族研究》2004年第4期。
- [72] 覃主元:《汉代合浦港在南海丝绸之路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1期。
- [73] 熊昭明:《汉代合浦港考古的新进展》,《岭南印记:粤港澳考古成果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博物馆编,2014年。
- [74] 吴传钧主编:《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
- [75] 陆露、张居英:《西汉合浦港口考辨》,《广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1期。
- [76] 郑君雷:《俗化南夷——岭南秦汉时代汉文化形成的一个思考》,《华夏考古》2008年第3期。
- [77] 富霞、熊昭明:《从广西发现的土墩墓看越人南迁》1982考古》2016年第8期。
- [78] 蒋廷瑜:《广西汉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
- [79] 洗剑民:《秦汉时期的岭南农业》,《中国农史》1988年第3期;《汉代岭南的青铜业和冶铁业》,《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汉代岭南的商业萌芽》,《岭南文史》1988年第1期。
- [80] 吕平中:《秦汉时期的岭南经济》,《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